

江淮英烈

第二輯



安徽人民出版社

K812
65/2

2

江淮英烈

第 二 辑

安徽省民政厅主编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2年·合肥

书名题签：李 源

封面设计：赵 其 阳

江 淮 英 烈

(二)

安徽省民政厅主编

*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跃进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25 插页：2 字数：233,000

1982年9月第1版 1982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6,000

统一书号：11102·38 定价：0.90元

(限 国 内 发 行)

目 录

陈延年烈士传略.....	孙其明(1)
陈乔年烈士传略.....	孙其明(21)
白山黑水吊忠魂	
——记董长荣烈士.....	蒋晓钟(32)
方运炽烈士光辉的一生.....	赵志华 韩玉春(43)
余大化烈士传略	
附:余化民烈士.....	蒋晓钟 彭生高(54)
乔锦卿烈士传略.....	张国领 孙中明 周广庭(62)
吴干才烈士传略.....	苏建中(68)
孙敬纯烈士传略.....	叶含荪(74)
夏雨初烈士传略.....	涂维龙(78)
陈履谦烈士传略.....	吴翠芬(87)
谭梓生烈士传略.....	张德裕(92)
革命的棠棣之花	
——记周传鼎、周传业烈士.....	张 益(98)
刘仁辅烈士传略.....	建 清(104)
操球烈士传略.....	操震球(110)
王绍虞烈士传略.....	苏建中 吴之信(116)
王培吾烈士传略.....	李秉隆(120)
英名长留在人间	
——记李坦烈士革命活动片断.....	范先荣(127)
皖南山区的星星之火	
——记王金林烈士的英雄事迹.....	史 德(133)
高风亮节光照后人	

- 张蕴华烈士革命的一生 周广庭 张 民(142)
- 寿县早期党组织创建人之一——薛卓汉烈士
..... 李传安 彭生高(152)
- 胡祥仁烈士传略 方罗来(161)
- 曹鼎烈士传略 马子魁(168)
- 肥北农民运动的一盏明灯
——崔筱斋烈士传略 杨 夏(174)
- 风雨长淮擎旗人
——记朱务平烈士战斗的一生
..... 周广庭 孙中明 张国领(185)
- “生当作人杰 死亦为鬼雄”
——记陈雪吾烈士 叶大庆 曹秉忠 彭生高(195)
- 张守仁烈士传略 旭 光(204)
- 刘敏烈士传略 黄松泉 范光荣(212)
- 女中英烈垂千秋
——记宋继蕴烈士 胡茂发 王毓生(219)
- 附：宋于斯烈士 向 前(224)
- 颜文斗烈士事略 杨度元 吴 明(226)
- 附：马子中烈士 范光荣(236)
- 曹广海烈士传略 马子魁 李传安(237)
- 附：曹广梅烈士 (242)
- 长留正气在人间
——记凌霄烈士 肖志远 叶晓明(244)
- 大别山上一棵松
——记桂月峰烈士的光辉事迹 鲍劲夫 台运行(255)
- 桂伯炎烈士传略 鲍劲夫 台运行(263)
- 附：桂明田、桂尊农、桂尊林烈士 鲍劲夫 台运行(272)

在革命风暴中成长的文艺女战士

——记廖赤见烈士的光辉事迹……………倪方六 (2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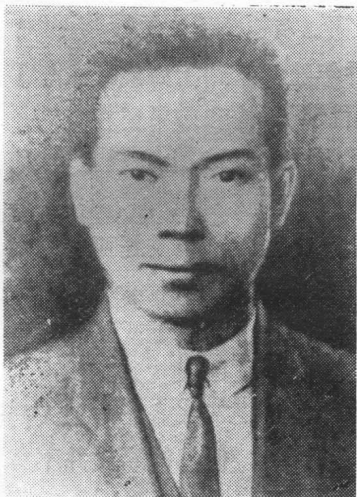
附录: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形势图……………肖志远绘制

安徽省革命斗争大事简记……………(278)

陈延年烈士传略

孙其明



陈延年烈士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曾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江浙区委书记、江苏省委书记等职，并被选为党的五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一九二七年七月，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下壮烈牺牲，年仅二十九岁。

(一)

延年同志是安徽怀宁县人，一八九八年生。祖父陈象五早逝。叔祖父陈昔凡，清末举人，曾在奉天（今辽宁省）任州、县官职。父亲陈独秀，为陈昔凡嗣子，青年时代受西方民主主义影响，背叛封建家庭，从事革命活动。母亲高氏，生子女四人，延年同志居长，其妹玉莹次之，三弟乔年，四弟松年，陈家世代书香，封建礼法极严。

延年六岁入私塾读书。他聪颖好学，求知欲极强，几年内读了许多经史典籍，在国学方面有较深的造诣。十二、三岁起，先后就读于安庆尚志小学和全皖中学，开始接触近代科学知识，眼界为之大开。他不仅喜欢博览群书，而且经常向社会上一切有知识的人求教。安庆城里有座迎江寺，他同迎江寺的和尚交往甚密，一有空闲，便到迎江寺听和尚谈天说地，评古论今，从中增长了

见识，加深对中国社会的了解。

延年同志的少年时代，正当中华民族陷于苦难的深渊。他目睹帝国主义的军舰在流经故乡的长江里横行霸道，而清王朝却对帝国主义奴颜婢膝。他也看到，爱国的仁人志士为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清王朝专制进行英勇的斗争。他痛恨黑暗的旧社会，也为革命志士的英雄行为所激励。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开始萌发革命的反叛性。祖母和母亲盼望他继承祖业，但他却决心挣脱封建家庭的樊笼，寻找改革社会的道路。

一九一五年前后，延年和弟弟乔年随父亲到上海继续求学。一九一七年，其父应聘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他和弟弟留在上海，初入法国巡捕房附设的法语补习班学习法文，后入上海震旦大学。由于学习勤奋，不久即获得“法文极佳”的赞誉^①。

延年弟兄在上海，生活艰苦。父亲赴京时，曾委托亚东图书馆从其稿费中每月支付十元给他俩作生活费。此款除缴纳学费，购置书籍文具外，所剩无几，因而他俩只能“寄宿于《新青年》杂志发行所（四马路亚东图书馆）店堂地板上，白天在外工作谋生自给，食则俸饼，饮则自来水，冬仍衣衾，夏不张盖，与工人同作工，故颜色憔悴，人多惜之……”^②当时，他们的家庭并不穷困，祖父陈昔凡死后，在北京、上海都留下产业，祖母谢氏也再三表示供给他俩一切费用，但他们坚决不要封建家庭接济，决心在艰苦环境中磨炼自己。

十里洋场的丑恶现象，进一步激起延年同志对现实的不满，使他更加强烈地追求革命真理。当时，以他父亲陈独秀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所发动的新文化运动正在蓬勃兴起，各式各样的新思潮先后被介绍到中国来。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传入中国的新思潮中，固不乏革命真理，但也有很多谬说。延年此时分辨真理与谬误的能力不强，因而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他阅读过不少无政府主义的书刊，崇拜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学说，曾与中国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郑佩刚等合编《进化》杂志，并以“人”

为笔名，在《进化》杂志上撰文宣传无政府主义。但是，即使在信仰无政府主义的时候，他仍然主张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他赞成和拥护“五四”爱国运动，认为“这次学潮，含有无产阶级斗争之意义，千古未有。”^③并号召人们“拿一副极坚强的奋斗精神反抗恶社会”，强调革命必须“排患御困，勇往前进”，即使“进了黑屋子，上了断头台”，^④也在所不惜。由此说明，他虽在寻求真理的漫长道路上走了一段弯路，但他的基本倾向是革命的。

(二)

一九一九年下半年，国内兴起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为了继续寻找革命真理，延年兄弟决定赴法勤工俭学，同年底离沪，次年二月三日到达巴黎。由华法教育会资助，进入巴黎大学附设的阿里雍斯学校，学习文学、历史、地理、博言学、法国文明史等课程，打算学完上述课程后，再投考巴黎大学深造。不久，因为无政府主义者控制的华法教育会宣布与勤工俭学生脱离经济关系，不再给以资助，他不得不离开阿里雍斯学校。此后，弟兄二人时而到里昂，时而回巴黎，一面做工维持生活，一面刻苦自学。

在法国的一、二年内，他仍然信仰无政府主义，曾编辑留法无政府主义者的刊物《工余》，并同法国早期的无政府主义者格拉儒等人交往。但是，从一九二一年开始，他的思想逐渐发生变化。在法国，他进一步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性，也逐渐看到无政府主义的欺骗性，因而开始对自己的信仰产生怀疑。由于对无政府主义的失望，促使他更多的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对比之下，他对无政府主义的怀疑日益加深。然而，使他的信仰发生根本动摇的，还是实际斗争的启示。

一九二一年间，留法勤工俭学生进行了三次重大的斗争：第一次，由于无政府主义者控制的华法教育会宣布同勤工俭学生脱离经济关系，使得千余远离祖国的青年陷入勤工无路，俭学无门

的困境，迫使他们于二月二十八日发动争取生存权和求学权的斗争，即“二·二八”运动。第二次，是六月间发生的勤工俭学生为维护民族利益，反对中法大借款的“拒款”斗争。第三次，即勤工俭学生于九月间发动的，为解决求学问题而强行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的运动。在这三次斗争中，控制华法教育会的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李石曾、褚民谊与当时中国驻法公使陈篆等人，不但不支持勤工俭学生的正义行动，反而勾结法国反动当局对勤工俭学生加以迫害。他们的丑恶表演，使延年更清楚地看出了无政府主义的欺骗性和反动性。他和进步的勤工俭学生一起，同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李石曾等人进行坚决的斗争。此后，他便抛弃无政府主义，转向科学的共产主义。据当时在法国的陈公培回忆：

“留法勤工俭学生同吴稚晖等的斗争，考验了无政府主义派。……，这次运动，则使他们起了分化。陈延年、陈乔年等在斗争中认识了吴稚晖等的面目，从此脱离了无政府主义派。”^⑤赵世炎也在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六日致陈公培的信中说：“李合林事件后，安那其朋友奋然而起。但以我观察，有一部之安那其倾向颇变，其最著者为大陈——延年——趋向极为可爱，……”^⑥在与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中，他同共产主义者周恩来、蔡和森、赵世炎、王若飞等同志有了更多的接触，获得他们的支持和帮助。一九二二年夏，他参加了筹建旅欧共产主义组织。这是他与无政府主义彻底决裂的标志。

一九二二年六月，旅欧的共产主义者在巴黎西郊布伦森林小广场正式成立“中国少年共产党”。一九二二年八月，经当时的法共党员阮爱国（胡志明）介绍，延年和世炎、乔年、若飞、肖三等同志加入了法国共产党。同年十月，李维汉同志代表旅法“中国少年共产党”回国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三年，中共中央通过廖焕星带信到法，正式承认原旅欧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及参加法共的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组成中共旅欧支部，延年和恩来、世炎等同志均被选为支部领导成员。

一九二三年初，旅欧支部接到中共中央赴莫斯科代表团团长陈独秀的指示信，决定派世炎、延年、若飞、乔年等十二人第一批赴俄学习。三月十八日，他们由周恩来同志伴送离法，四月上旬到达莫斯科，进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系统地学习唯物史观、经济学、俄国共产党党史、国际职工运动史及自然科学常识、俄语等课程。学习期间，他刻苦读书，认真听课，仔细作听课笔记和读书笔记，经常和世炎、若飞、乔年等同志一起交流学习心得，讨论疑难问题。他平时沉静寡言，但在讨论原则问题时，却能积极发言，热烈争论，非把问题弄清不可。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认真，他回答说：“列宁在争论原则问题时如同猛狮，我们也要学列宁”。同志们都十分敬佩，常戏称他为“小列宁”。

我党在莫斯科设有中共旅莫支部。延年、世炎同志抵莫不久，也参加了支部工作。世炎同志任支部委员，延年同志为支部干事，负责组织工作。在不长的时间里，他就和世炎同志一起介绍了黄平、袁庆云、王凌汉等人入党。

一九二四年夏，国内革命斗争急需大批干部，党中央陆续抽调旅欧、旅俄的同志回国工作。延年同志这时也奉命离俄回国，九月下旬抵达上海。当时，全国正处于大革命前夕，中央决定派他到广东工作。

(三)

一九二四年十月初，延年同志抵达广州，初期负责共青团广东区委工作。十二月，原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周恩来同志到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他便接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直到一九二七年三月离开广东为止。

党的广东区委又称两广区委(代号“管东渠”)，领导广东(包括香港)、广西和福建南部地区，地位十分重要。延年同志就任后，首先建立和健全区委各个工作部门，同时，大力发展各条战线的先进分子入党，扩大和巩固党的基层组织。区委经常举办各种训

练班和报告会，定期给党员上党课，并规定严格的组织生活制度。延年同志经常深入一些重要的支部了解情况，参加支部的会议，与基层同志商讨问题。由于他和广东区委其他负责同志卓有成效的工作，在短短二、三年中，广东党组织由数十人发展到近万名党员，而且组织严密，战斗力强，有优良的党风，在广东历次重大斗争中发挥了坚强的核心作用。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广东是全国的革命策源地。但在初期，由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支持的买办资产阶级、地方军阀和地主阶级等反革命势力十分嚣张，时刻威胁广州革命政权。延年和恩来等同志领导广大党员和工农群众，为扫除各种反革命势力，巩固和统一广东革命策源地，进行了多次的战斗。

一九二四年十月，以英帝国主义走狗、大买办陈廉伯和大地主陈恭受为首的商团，在广州发动武装叛乱，妄图推翻广州革命政府。共产党人和广大工农群众坚决要求革命政府予以讨伐。为了推动孙中山先生下决心镇压商团，延年同志和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亲赴韶关，面见孙中山先生，力陈镇压商团的必要，同时代表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表示愿作坚强后盾，终于促使中山先生下令北伐部队回师广州，扫平商团。中山先生并组织革命委员会和临时军事指挥部专负其责。延年同志不但参与了革命委员会的工作，而且直接动员和指挥广州的工团军和农民自卫军配合革命军作战，因而迅速击溃商团武装，初步巩固了广东革命策源地。

商团反动武装覆灭后，盘踞在东江一带的陈炯明反革命势力在英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唆使下，乘中山先生北上之机，企图进犯广州，颠覆革命政府。在广东区委和延年、恩来同志积极倡议下，广州革命政府决定出师东征。广东区委一面动员黄埔军校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参加东征军，发挥英勇作战和自我牺牲的革命精神；一面派彭湃同志等去海陆丰一带，进一步发动当地工农群众支援和配合东征军作战。一九二五年二月，第一次东征开始，周恩来同志随军出发，直接参与东征军的领导和指挥工作。延年

同志则留在广州，继续宣传和组织群众，并由广东区委发表题为《檄告广东工农群众，保卫革命，打倒陈炯明》的宣言，号召广东工农群众和革命军人团结一致，为彻底肃清陈炯明的反动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由于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奋勇参战，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便肃清了除惠州以外的广东东部的陈炯明的反革命势力。

正当东征军在东江前线英勇奋战之时，盘踞在广州市区的滇军杨希闵和占据西江一带的桂军刘震寰相互勾结，阴谋发动叛乱。六月上旬，杨、刘所部控制了广州市区，广州革命政府被迫撤至河南一带，广东革命策源地陷入危急状态。面对这一严重局势，广东区委和延年同志主张立即调东征的黄埔学生军回师讨伐，国民党左派对此极表赞同。六月十一日，调回广州的东征军和由黄埔军校在校学生组织的突击队，向杨、刘叛军发起总攻，区委和延年同志全力发动和组织工农群众支援和配合革命军作战。六月十二日，滇、桂军阀的反革命武装全部被歼，广州又回到革命人民手中。

七月一日，国民政府正式成立。在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的支持下，国民政府驱逐了国民党老右派代表人物胡汉民、许崇智。十月，国民政府举行第二次东征和南征，彻底击溃了陈炯明和另一个军阀邓本殷的反革命军队，基本上扫除了广东境内所有的反动武装。

经过共产党人、工农群众、革命士兵和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奋战，广州革命政权和广东革命策源地才一次又一次地转危为安，获得真正的巩固和统一，为后来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展奠定基础，并且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

(四)

延年同志担任广东区委书记后，即以很大精力领导广东的工人运动。他曾同人力车夫一起拉车，同搬运工人一起干活，同铁

路工人和海员工人一起谈心，与国民党官僚形成鲜明的对照。使群众看到，共产党人才是工人阶级真正的领导人。他和区委工人部的刘尔嵩等同志经常深入各重要工厂、铁路，参加工人的会议，指导工会的工作。经过一番努力，不仅健全了各级工会，还建立了工人阶级的武装——工团军，在平定商团叛乱、两次东征和讨伐杨、刘等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九日，广东区委和全国总工会为声援上海“五卅”惨案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这次罢工从准备到发动，坚持和结束，始终在广东区委和陈延年、邓中夏、苏兆征等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的。罢工中所有重大决策，也都经延年和邓中夏、兆征等同志研究决定。延年同志还亲自参加并指挥了六月二十三日在广州举行的十万群众反帝大示威，当示威队伍经过沙面英租界对岸的沙基时，英帝国主义者竟命令水兵巡捕用机枪扫射，当场死亡五十二人，重伤一百七十余人，轻伤无数，造成了惨绝人寰的“沙基惨案”。惨案发生后，延年同志立即召集区委紧急会议研究，同时与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磋商，除由广东革命政府向英帝国主义提出严重抗议，宣布对英经济绝交外，并组织罢工工人纠察队，对香港实行全面封锁，使英帝国主义者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在区委和延年、邓中夏、兆征等同志领导下，建立了罢工委员会和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团结全体工人，坚持长期斗争。同时在策略上改变了罢工初期提出的“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实行“单独对英”的正确方针，从而打破了帝国主义者拼凑“联合阵线”的反革命企图，最大限度地孤立当时最顽固的英帝国主义。罢工期间，区委和延年同志通过各种形式，不断对罢工工人进行教育。广东区委和全国总工会的领导人经常为工人代表作报告，一九二五年十月九日举行的第三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延年同志以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班教授名义，向与会人员阐述省港大罢工在中国革命斗争中的重要作用，并以历史经验证明，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必将取得最后胜利。^⑦他的报告使工人群众进一

步明确了肩负的历史重任，增强了斗争的胜利信心。

省港大罢工从一九二六年六月十九日开始，到一九二七年十月十日自动宣布结束，共坚持十六个月，成为世界工运史上坚持时间最长的一次罢工。这次罢工不仅沉重地打击了英帝国主义，而且有力地促进了广东革命策源地的巩固和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

延年同志就任广东区委书记之初，在区委设立农民部（亦称农委），由彭湃、阮啸仙等同志具体负责，并派出一批共产党员到农村发动和组织农民，在农民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一九二五年四月，经区委批准，在海陆丰建立党的特别支部，十月，又建立中共海陆丰地委，任命彭湃同志担任地委书记。这些措施促进了海陆丰农民运动的发展。从一九二四年七月至一九二六年九月，先后由共产党人彭湃、阮啸仙、谭植棠、毛泽东等同志主持，在广州办了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延年同志经常听取农讲所的工作汇报，并与毛泽东、彭湃等同志共同商讨工作中的问题。每届农讲所从招生、训练到结业后学员的分配，区委和延年同志都给以关怀和支持。六届农讲所先后为广东全省和全国培养了七百多名农运骨干，为推动广东和全国的农民运动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农民运动的发展，引起了豪绅地主的仇视，他们千方百计进行破坏，并杀害农运积极分子。广东区委和延年同志积极领导农民建立农民自卫军，与豪绅地主的反动武装对抗。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广宁县农会因受地主武装压迫向广东区委告急，延年同志与周恩来同志商定，派我党掌握的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两个排赶赴支援。后来，区委和延年、恩来同志又应广宁农民的要求，在征得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同意后，加派大元帅府卫士队随带大炮一门增援正在鏖战的铁甲车队，攻打地主武装盘踞的炮楼，终于取得了胜利。从而大长了农民的志气，大灭了豪绅地主阶级的威风。

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广东区委在广州领导召开全省第二次

农民代表大会。当时，广东的农会组织已遍及六十六个县，会员达六十二万人。大会开幕时，广东区委发表了《致广东省第二届农民代表会议的信》，阐述农民运动在国民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强调指出：农民解放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如果农民得不到解放，“国民革命决没有成功的希望”。大会以后，广东农民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斗争出现了新的高潮。

为了领导青年学生运动，区委设立青年部和学生部，由恽代英等同志具体负责。延年同志也经常深入青年学生中了解情况，给以指导。广东大学(后改称中山大学)的左派学生组织“新学生社”，在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带动下，对教育和团结广大进步学生，反对右派学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后来也出现一些“左”的偏向。延年同志及时建议“新学生社”自动解散，另成立包括全体青年学生的“学生会”，以团结处于中间或落后状态的青年。有些人对此有抵触，延年同志便以自己的切身体会教育他们，他说：“我曾经是克鲁泡特金的学生，后来才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才知道无政府主义行不通。青年人有各种各样的思想并不奇怪，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不要看不起他们，要善于团结他们。”^⑥在区委和延年、代英同志领导下，召开了旨在统一全省学生运动的广东省学生代表大会，大会强调，只要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争取民族独立的，都应联合起来。在遵守这个共同纲领的前提下，允许学生有不同主张和信仰。这对于最广泛地团结青年学生，壮大革命力量，打击反动势力，起了很好的作用。

建立和发展革命武装，也是广东区委和延年同志极为关注的一件大事。黄埔军校建立不久，周恩来同志担任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区委和延年同志选派许多党的重要干部到军校担任政治和军事教官，并不断动员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左派青年到军校学习。有的青年受封建时代“好儿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思想影响，不愿参加革命军队。区委和延年同志便耐心进行教育，使他们分清革命武装与反革命武装的不同性质。他还和周恩来同志一

起在军校建立党的组织，并派遣党的得力干部到各军、师担任党代表或政治部主任，以便对这些军队进行改造。在工团军和农民自卫军中，也抽调有军事素养的共产党员去充当干部或教练。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区委征得孙中山先生同意，筹建“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并从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中抽调一批共产党员具体负责。铁甲车队的党组织直属广东区委领导，其工作也直接请示区委和延年、恩来同志解决，实际上是我党直接控制的第一支革命武装。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广东区委和延年、恩来同志又决定建立党直接领导的，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的独立团。该团后来作为北伐军的先遣队，屡建战功，威震全国，被誉为“铁军”。

（五）

随着广东革命策源地的巩固和工农运动的发展，在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内部，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的斗争日益尖锐起来。延年同志和毛泽东、周恩来同志一起，坚决执行了团结国民党左派，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正确方针，并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坚决的批判和斗争。

在革命统一战线中，延年同志十分注意维护我党的独立性。他常对周围的同志说：“我们要提高警惕，不要为国民党抬轿子，不要做国民党的‘姨太太’。”^⑨他坚决反对当时党内某些领导人中流行的一种错误观点，即认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只能处于帮助国民党的地位，只能充当革命的苦力。他曾严肃而气愤地指出：“‘苦力主义’是要不得的。”^⑩

延年同志在广东工作期间，始终和国民党左派保持密切合作的关系。对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等，延年同志不仅尊重他们，而且积极支持他们的正确主张，联合他们共同奋斗。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柳亚子，因受右派排挤，一度称病到大沙头颐养院疗养。延年同志专门派当时在区委机关工作